

八〇年代歐洲「和平運動」初探

吳東野

東、西歐的「和平運動」風潮現已成為國際政治舞臺上的一個熱門新話題，聯合國且定今（一九八六）年為「國際和平年」。在此一運動的蓬勃發展中，西歐生態團體與共黨的互爭領導權，使現階段歐洲的和平主義思潮更趨複雜；東歐和平團體則因共黨政權之鎮壓，淪為地下活動。本文不擬對示威活動方式作報導性論述，祇就此運動形成之背景及現象作一扼要分析。

一、導言

「和平運動」究竟是一種激進的反破壞生態運動或指某些團體懼怕核武戰爭而萌發的烏托邦思想，迄今尚無肯定的詮釋。大體而言，「和平運動」概屬社會運動之一環，表現在公開的抗議示威，對抗現存政治及社會體制，參與成員來自社會各階層，以年輕人居多，並無特定的組織架構。

歐洲的「和平運動」並非八〇年代之產物，它起源於五〇年代末期英國的「核武裁軍活動」（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歷經六〇年代末及七〇年代初西歐新左派思潮興起與反越戰示威活動，逐步奠定今日之基架。

早期西歐推展「和平運動」深受蘇聯的宣傳影響，甚少涉及人權問題，似乎有意改變西歐人民對蘇共的敵對態度，蓄意製造核子戰爭源於美國威脅之假象^①。這種「反美主義」（Anti-Americanism）傾向實為六〇年代反戰風潮的肇因。同一時期，西歐一批親共的歷史學家也加入推波助瀾的行列，大肆渲染五〇年代初東、西冷戰應歸罪於美國的好戰，同情俄國人自沙皇時代起

註① 見 Cf. Richard/J. Barnett, *The Allianc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P. 421.

即飽受列強侵略之觀點，並以兩次世界大戰俄國皆受到波及為由，將今日蘇聯的擴軍及鎮壓政策解釋為「出於懼怕」^②。這種思維方式主導了七〇年代的西歐「和平運動」。尤有甚者，當蘇聯入侵阿富汗後的兩三年，北歐一部分學者甚至將蘇聯的侵略行為與北約的「雙重決定」^③牽扯在一起，意謂蘇聯乃係擔心美國利用阿富汗進行圍堵戰略，不得不先下手為強^④。

及至八〇年代初，西歐的「和平運動」逐步開展成一種對當政者政策不滿的社會羣眾運動。這股來自年輕一代不滿現實的風氣與東、西關係從緩和迅速走向對抗所造成之震撼有關，進而促成現今和平主義分子追尋「鴉鳥精神的安全政策」（即「核子時代的新和平主義」^⑤）之主因。

八〇年代西歐的「和平運動」有宗教意識、有人道主義傾向、亦有與國際共黨互通款曲者。很多人認為西歐此種「和平運動」是一種「國會外的民衆運動」（External Parliamentary People's Movement），能真正代表民意。持此論者也坦認其組織渙散、參與之團體相當複雜，懷疑此種反政府既定政策又反現行體制之傾向，已經混淆了經濟社會規範與個人自由的關係。

反觀東歐的「和平運動」，唯一受官方保障准許公開活動的是東德的「和平委員會」（Peace Committee），其與莫斯科控制下的赫爾辛基「世界和平理事會」（World Peace Council）^⑥合作無間。近兩三年來，東歐的「和平運動」起了質的變化。跡象顯示，非官方的和平團體打著中立旗號，甚或否定共黨政權意願，不僅譴責東、西陣營軍備競賽，有時批判蘇聯的措詞之強烈，甚於一貫之反美。當然這些團體相對受到的迫害也最大：蘇聯境內的和平組織 Grappa Doverija 成員雖未與其他著名積極的東歐和平團體取得連繫，而受到的威脅及懲罰却最多^⑦；捷克當局視為非法的和平組織「七七憲章」（Charta 77）對世界和平與安全問題一向具獨特見解，頗能廣泛代表民意；波蘭與匈牙利的「和平運動」發展情況特殊，波蘭的「團結工聯」（Solidarity）受民衆支持，勢力相當龐大，儘管波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禁止其活動，波蘭的「和平運動」並未因此消聲匿跡；匈牙利的「和平對話團體」（Peace Group for Dialogue）自一九八二年成立以來，雖較其他東歐國家類似團體享

註② 見 J. A. Emerson Vermaat, *Neue Trends in Westeuropas Friedensbewegung*, in: *Außenpolitik*, 1/86, p. 55.

註③ 吳東野，〈試論西德外交與安全之決策體系〉，《問題與研究》，第廿五卷第十期（民國七十五年七月十日），第八一頁。

註④ 此類主張之學者以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的白樂比先生（Paul Barnaby）為代表，替蘇聯尋求「緩衝國」（buffer state）辯護。

註⑤ 講者 G. Günther Schmid, *Zur Soziologie der Friedensbewegung und des Jugendprotestes*,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 24/82, pp. 15-30, hier p. 15.

註⑥ 見 Cf. Reinhard Henkys (Ed.), *Die Evangelischen Kirchen in der DDR*, München (Chr. Kaiser Verlag), 1982, P. 370ff.

註⑦ 見 J. A. Emerson Vermaat, *op. cit.*, p. 54.

有較多的自由，但却缺乏影響民意之功能，目前已分裂為兩個敵對團體，其中之一開始與「世界和平理事會」匈牙利分支機構合作^⑧。

二、「和平運動」興起之背景

任何一種運動之興起自有其主觀與客觀因素。工業國家物質文明發展至一定程度時，一旦精神文明跟不上腳步，隨之而來的即為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生活環境品質降低^⑨，價值觀念改變，都市發展形態、教育和工作機會、家庭休閒生活等產生不協調，年輕一代對未來悲觀與迷惘。西德（聯邦青年、家庭、健康部）曾對全國廿五歲以下青年作過抽樣調查，發現：四分之三的年轻人對「科技使人類進步」的信念產生動搖；九五%認為戰爭終將無法避免；八〇%相信未來能源經濟危機和大饑荒會再現；七八%對未來人類將更趨平等之說懷疑；七四%認為科技的進步已使環境受到破壞^⑩。在實際生活層面出現的問題尚包括：

- (1)、上下兩代間的相互不信任，尤其是年輕一代從政者忽略生態環境保護工作。
- (2)、廿歲以下的青年失業人數激增，根據八〇年代初統計，已達七·六%^⑪。
- (3)、父母工作在外，對子女教育無法兼顧，以物質生活寵溺補償的結果使年輕一代驕縱跋扈^⑫。
- (4)、十二歲至廿三歲的青少年最普遍的休閒活動為聽音樂或看影片，而大眾傳播媒體製作的節目每下愈況，淪於庸俗與暴力，影響人格的發展與國民品質的提升。

所謂客觀因素多肇始國際政治局勢之變化，尤以七〇年代中期第三世界局勢的動盪不安，影響至鉅：一九七五年春越南停火協定崩潰，同年夏美蘇限武談判失敗，七月美蘇在赫爾辛基簽定的有關經濟安全合作協定中為人權解釋問題爭執不休，同時蘇聯又利用古巴將魔爪伸入非洲；至一九七九年二月伊朗扣留美國大使館人質，十二月蘇聯入侵阿富汗，次年冬波共鎮壓「團結工聯

註^⑧ *Ibid.*

註^⑨ 社會學者將「生活品質」詮釋為：足夠的供應與平衡，社會分配公平，參與機會均等，而能滿足個人需求；請參閱 Wolfgang Zapf (Ed.), *Lebensbedingung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 Sozialer Wandel und Wohlfahrtsentwicklung*, Frankfurt/M., 1977.

註^⑩ 見 Shell-Studie, "Jugend" 81" - *Lebensentwürfe, Alltagskulturen, Zukunftsbilder*, 3 Bände hier Bd. 1, 1981, P. 15.

註^⑪ 根據西德「聯邦勞工部」所公佈的青年失業率，一九八一年達三·九%，一九八二年激增至七·六%。見 *Der Bundesminister für Jugend, Familie und Gesundheit* (Ed.), *Juge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heute-Aufbruch oder Verweigerung*, Bonn, November 1981, P. 31.

註^⑫ *Ibid.*, P. 94 ff.

」。這一連串事件，皆增強了東、西陣營間的緊張關係。同時，蘇聯的不斷擴軍及雷根總統上臺後的強硬外交政策，更使西歐人民感到戰爭迫在眉梢，懷疑美蘇限武談判會有任何進展，企圖以「壓力團體」的姿態，影響官方政策。於是，各式「和平運動」團體乃相繼而生。這些團體具有如下的共同特徵：

(1) 懼怕：害怕往往造成情緒紊亂、喪失理性之判斷。「和平運動」所掀起的一股「反專家政治」(Counter-expertise)^②風潮即是在人類天生自然懼怕戰爭的反應下產生的相對行為表現。

(2) 自發性：「和平運動」分子對現實政治的反應並未經長時間的理論探討，亦非基於意識形態不同所產生的必然結果，而係出於主觀意識與經驗的累積。

(3) 標榜道德：「道德動機」一向為從政者所低估，而和平主義者，尤其是宗教團體，多運用「非暴力的不服從」(disobedience without use of force)手段抵制政府的軍力政策^③。

(4) 持續性：持續的原因與東西歐特殊的地緣和政治現狀有關，西歐國家國防安全政策每項措施皆含有解決歐洲分裂狀態的終極目標，「和平運動」乃得以再三從新的主題上延伸不絕。

三、西歐的「和平運動」

八〇年代初，西歐的「和平運動」團體基本上仍陷於追尋一廂情願的安全政策泥淖中，經常討論的四個主題是：(1)將歐洲劃為核武中立區；(2)軍事防禦以傳統武器為主；(3)單方面裁軍；(4)提倡「社會防禦」(social defence)觀念，其中以第一項主題在各個和平團體中最無爭議。明顯的例子是一九八一年冬西歐國家幾乎同時進行上百萬人的示威活動(見附表)，其宗旨即為「反對西歐部署核武，制止東、西陣營軍備競賽」^④。此舉是歐洲和平政策的轉捩點，也間接引發了一九八四年底西歐國家許多縣

註② 見 Jeffrey Herf, *War, Peace and the Intellectuals—The West German Peace Movement*,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pring 1986), Vol. X, No. 4, pp. 172-200, here p. 193f 有鑒「反專家政治」尚可參考 Dieter S. Lutz, *Weltkrieg wider Willen? Die Nuklearwaffen in und für Europa*, Reinbek, 1981.

註③ 有關「非暴力的不服從」手段請參閱 Aktion Sühnezeichen/Friedensdienste 所出版的四萬份「行動手冊」(Aktionshandbuch) *Frieden schaffen ohne Waffen*, Aktionshandbuch 2, Barnheim-Merten, 1981.

註④ 一九八一年西德的「和平共同行動」機構會出版一本介紹西歐示威活動專書，全書二百餘頁，並附有多幀圖片，請見 Aktionsgemeinschaft Dienst für den Frieden (Ed.), *Bonn10.10.1981: Friedensdemonstration für Abrüstung und Entspannung in Europa* (Reden, Fotos), Bornheim, 1981.

市逕自宣稱其管轄地為「核武中立區」^⑥。這種行動風潮且有逐漸增強的趨勢。從西歐和平示威活動參加的人數中雖無法定論各國「和平運動」之強弱，亦不易勾劃出和平主義具體之輪廓，但是我們可以推論西歐「和平運動」團體已有組織上的串連，時間大致在一九八二年「歐洲核武裁軍」(European Nuclear Disarmament:END)年會之後，其中尤以西德「和平行動組織」(Aktion Sühnezeichen/Friedensdienste)及荷蘭「教會和平理事會」(IKV)之關係最為密切。值得一提的是，西德十位研究和平問題的學者、記者及宗教界人士組成的超宗教工作團體——「逐步裁軍」(Shritte Zur Abrüstung)，曾配合一九四四年即已在法國成立的世界和平運動組織 Pax Christi共同提出東、西方裁軍建議^⑦，推動「和平運動」步向國際化。

西歐的「和平運動」發展以西德最受矚目，其與地處西方盟國最前線，對美蘇擴軍政策較為敏感固然有關，然主要是深受七〇年代中期荷蘭和平組織發動反中子彈示威成功的經驗影響^⑧。因此西德和平團體示威最為頻繁，參與團體也最為複雜。

從政治文化層面觀察，德國的和平主義思潮早在本世紀初即已形成^⑨。這項傳統在第三帝國時期(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與反對納粹干預教會活動的新教教會勢力相結合，不僅使西歐「和平運動」的理論基礎趨於複雜，對戰後聯邦德國的政治型態亦深

註⑥ 一九八四年底宣佈「核武中立區」的西方國家縣市數量上統計如下：比利時(248)、英國(157)、愛爾蘭(117)、挪威(81)、荷蘭(71)、美國(58)、義大利(53)。請參閱 A. Smirnov, *The Nuclear Threat and the Extension of the Peace Front*,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September 1985), Pp. 44-52.

註⑦ 法國的「和平運動」較其他西方國家具強烈共產主義色彩，此與一九八一年密特朗上臺有關；採強硬路線，而大眾傳播界對此路線亦無太大爭議。荷蘭自一九六七年起，年年提倡「每週和平工作」活動(Work of Peaceweek)，以反歐洲核武為目標，其中最積極的兩個和平組織為：(1)「教會和平理事會」(IKV)；(2)共黨操縱的「反中子彈團體」(Stop de Neutron Bomb)。

註⑧ 有關德國的「和平主義」思想形成請參閱 Paul Noack/Theo Stammen, *Grundbegriffe der politikwissenschaftlichen Fachsprache* (Ehrenwirth Verlag, 1976), München, Pp. 229-230.

附表：一九八一年冬西歐各大城的和平示威

時間	地點	參加人數
10月10日	波昂	20~30萬
10月24日	羅馬	約15萬
10月24日	倫敦	7萬
10月25日	巴黎	5萬
10月28日	赫爾辛基	15萬
11月15日	馬德里	50萬
11月15日	雅典	30萬
11月28日	阿姆斯特丹	30萬
總計		約170~180萬

資料來源：Wilfried von Bredow, *Zusammensetzung und Ziele der Friedensbeweg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 24/82, P. 9.

具影響，甚至形成今日西歐「新和平主義」四種不同的意識：

(1) 宗教及人道的和平主義：此一趨向係由新教教會領導，其與政治劃清界線的人道號召吸引不少年輕教徒加入。
(2) 生態主義：工業迅速發展帶來環境品質之惡化，間接造成七〇年代保護生態運動之崛起。反對當政者因建築高速公路砍伐森林、因興建核能廠污染環境等措施的新興政治團體（如綠黨）應運而生。為數不少的知識分子倡議「社會防禦」及「和平的不服從」(Disobedience without use of force)等觀念，更助長其聲勢。

(3) 非教條化的社會主義：此類成員係唯一專注理論研究之團體，自稱既有的政治觀不同於蘇聯馬列教條及西歐的議會民主^②，特別吸引住大學社團和少數工會。某些政黨的外圍組織即支持此類論點，如西德「社會民主黨社會主義青年」(JUSO)或「基督教青年聯盟」(Christliche Junge Union)等。

(4) 共產主義：共黨在一些西歐國家政治發展中雖然成不了氣候，但在特定的工會內仍具影響力，西德共黨即擅於幕後控制和平組織的決策機構。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六日德共外圍組織「和平、裁軍、合作委員會」(Committee for Peace, Disarmament and Cooperation)領導的「克雷非號召」(Krefelder Appelle)聯署簽名者即高達兩百萬人^③。但自蘇聯入侵阿富汗及波蘭「團結工聯」事件後，德共的影響力日趨沒落。

四、現階段受壓抑的東歐「和平運動」

東歐共黨政權的和平宣傳充分顯示言與行的矛盾，對內禁止和平主義思想，對外却大肆鼓吹與傳播。大部分共黨國家內的和平組織都受到官方控制，很難達到西歐「和平運動」產生的正面效果。除了東德境內許多大城將生態保護及和平問題結合^④，發些微作用外，其他東歐鄰邦的和平組織幾乎乏善可陳。

整個東歐共黨國家內第一個受到鎮壓的民間「和平運動」組織是東德的「犁頭干戈」(Schwerter zu Pflugscharen)。

註①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波宏(Bochum)召開的第三屆「社會主義會議」(Socialistic Conference)會以「戰爭危險及和平政策」(Danger of war and

policy of peace)為題論及其政治概念。請參閱宣傳小冊“Friedensbewegung und die Linken”Hannover, 1981。

註② 公開簽署的第一人是「綠黨」黨員退休將領白思迪(Gerd Bastien，現為聯邦眾院議員)，該號召要求聯邦政府廢除允許西德境內部署核武飛彈之決議。

註③ 東德的大城指的是Leipzig, Dresden, Schwerin, Rostock, Neustrelitz, Ost-Berlin。

該組織起源於一九七八年基督教教會青年反對東德共黨在中小學施行「社會主義軍事教育」^②，總部設在素有東德「和平運動中心」之稱的德雷斯登市（Dresden）。同一時期，設於該城的「基督教學生會」（ESG）亦利用本身的刊物《呼籲》（Aufruf）起而響應，發展出獨特的和平政策。及至一九八〇年「基督教教會聯盟」（Bund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開始與「世界和平理事會」東德分支機構合作^③，雖然它和親蘇共的「天主教和平會議」（CFK）保持距離，內部不乏所謂的「紅」牧師（red rectors）與之勾搭，造成東德「和平運動」組織的分裂。

東德的新教會數量在東歐國家首屈一指，教會對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傳統上即佔有極重的份量^④。當八〇年代初東德的教會在對「和平運動」意義的自我詮釋下^⑤從事和平思想傳播，首度與西德教會組織恢復接觸^⑥，至此，東德的「和平運動」才算正式揭幕。

東德的「和平運動」屬於自發性的抗議活動，有別於西歐「和平運動」的模式，參與者多半不願與當政者對立，祇希望共黨政權正視其企求和平的心願^⑦，教會為其聚會場所，定期舉辦的討論會規模雖小^⑧，所造成的震撼則大。

七〇年代末，波蘭和捷克境內爭取獨立政策運動之興起對東德的和平主義思潮兼具鼓舞作用，蘇聯的進軍阿富汗及北約盟國

註② 一九七八年九月東德共黨規定中小學校九年級與十年級學生必須接受「社會主義軍事教育」，一時引起投書風潮，人民要求教會出面請求共黨廢止此一規定，結果並未產生效用，今日東德中小學校凡九至十一年級在學學生皆須接受軍訓。見 Wolfgang Büscher/Peter Wensierski/Klaus Wolschner, *Friedensbewegung in der DDR-Texte 1978-1982*, (Scandia Verlag, 1982), Hartingen, p. 64 ff.

註③ 見 Cf. Reinhard Henkys (Ed.), *op. cit.*, p. 370 ff.

註④ 東德宗教問題專家居席（Klaus Gysi）於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三日訪問倫敦的「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時即強調此點。見 *epd-dokumentation*, Frankfurt, 28/1981, p. 8.

註⑤ 東德教會對和平理念的自我詮釋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係一和平國家，以建設社會主義達到社會內部之和平，對外以社會主義國家結盟體系保障和平共存之外交政策反對帝國主義，並努力將世界各民族導向和平正軌，教會必須依上述之理念從事和平思想傳播工作」。見 Paul Wensierski, *Friedensbewegung in der DDR*,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 17/83, p. 6.

註⑥ 「東德教會聯盟」（DDR-Kirchenbund）與西德「德國基督教會」（EKD）係一九八〇年三月在東柏林恢復談判，以和平問題為主題，次年雙方並以「和平祈禱會」（Betgottesdienst für den Frieden）為名在西德召開會議，數萬人參與盛會。

註⑦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九至十九日東德教會首次召開年會（Friedensdekade），以「和平無武裝」（Frieden schaffen Ohne Waffen）為口號，與會者投書東德「人民議院」，呼籲共黨政權一切裁軍之努力應由本國做起。見 Peter Wensierski, *op. cit.*, p. 6.

註⑧ 通常在週末主辦的研討會主題皆與和平問題相關，例如：「非暴力行動」（Gewaltfreie Aktionen），「抉擇性安全體系」（alternative Sicherheitssysteme）或「和平語言」（Sprache des Friedens）等，其中最著名的討論會是在薩克森省的 Königwalde 舉行，每次與會人數總在四、五百人以上。

達成的「雙重決定」更直接促成一九八〇年九月「基督教長老會議」(Synode des Bundes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n)展開對國際政治層面的探討^⑤，不斷呼籲東德共黨與其他東歐聯邦共商單方面裁軍之決議，發表成立「社會和平服務機構」的共同意願，並主張對反兵役者予以個別的輔導，因而加深了教會與共黨政權間的緊張關係。

東歐非官方的「和平運動」處境特殊，一般而言既無特定人物的領導，又無大眾傳播媒體的支持，更乏組織架構的支撐，因此很容易受到共黨政權幕後操縱；由東德共黨對抗「犁頭干戈」組織所提出的口號——「和平必須武裝」(Peace must be armed)^⑥一事，即可窺出共黨混淆社會視聽，製造盼望和平的假象。

五、共黨介入西歐的「和平運動」

「和平運動」是東歐共黨政權對西方的戰略中一顆重要棋子，目的在誘導此運動之發展偏向對其有利的一面，以影響西方人民的視聽。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及十一月十三日西德執政的社民黨內政部長蕭樂(Andreas von Schoeler)在面對基民、基社黨黨團質詢時即曾指出：西德境內的「和平運動」受蘇聯「國安會」(KGB)操縱與津貼^⑦。同年十二月「西德通訊社」(dpa)宣稱聯邦及各邦「憲法保護局」長期觀察及調查結果顯示：「國安會」及其外圍組織在西歐的「和平運動」中雖祇控制到少數團體，但這些團體却是整個運動中最大、最積極者^⑧。

固然共黨的介入並非西歐「和平運動」坐大的唯一因素，然而以共黨龐大的組織力量居於幕後，實對西歐國家當政者增加不少困擾。以西德為例，德共在東德支持下藉其嚴密的外圍組織^⑨導演多次示威民衆與警方衝突事件^⑩，一九八一年著名的「克雷菲示威活動」即由德共外圍組織「德國和平聯盟」(DFU)一手策動，事件中五名重要領導成員有三名是德共黨員^⑪。

「克雷菲羣衆示威活動」是西德「和平運動」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德共不僅以大量資金援助，並於事後暗示成立「克雷菲倡

註⑤ 見 Cf. Reinhard Henkys (Ed.), *op. cit.*, p. 370 ff.

註⑥ 此口號為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SED, 即東德共黨)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底第三屆中委會上提出。*Ibid.*, p. 7f.

註⑦ 見 *Innere Sicherheit*, Information des Bundesministers des Inneren, Nr. 60, Erscheinungstag: 10. Dezember 1981, p. 19, 21.

註⑧ 見 *Süddeutsche Zeitung*, 9. 12. 1981, p. 8.

註⑨ 德共的大小外圍組織甚多，較有影響力者為：——「斯巴達克馬克思主義學生聯盟」(Marxistische Studentenbund Spartakus)——「德國社會主義勞工青年」(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jugend)——「德國和平聯盟」(Deutsche Friedensunion)。

註⑩ 見 *Verfassungsschutz 80* (Bundesminister des Inneren, Bonn, 1981), p. 87.

註⑪ 其餘兩名領導成員為「綠黨」黨員凱莉(Petra Kelly)及白思迪(Gerd Bastian)。

議團體」(Krefelder Initiative)^②，製造一連串反對美國在西歐部署巡弋飛彈之輿論，建議西歐各國「以裁軍替代嚇阻」，重新制定國家安全政策。示威團體却絕口不提蘇聯在東歐部署 SS-20 飛彈計畫對西歐可能形成之相對威脅，使西德的「和平運動」成爲西歐左傾激進分子的溫床。

1. 「綠黨」與親共組織分歧

一九八一年十月波昂和平示威事件是一番激烈爭論後的產物。共黨控制下的團體在籌劃階段即與一般和平示威團體意見分歧。在共同反對北約國家部署核武的意願基礎上，部分與會者(如「綠黨」)強調不能忽視蘇聯不斷擴軍的事實，裁軍應擴及全歐洲；親共分子則堅持和平的直接威脅來自美國的新式飛彈。事經妥協，雙方乃發表「共同呼籲」，並在「北約與華沙集團武器製造層出不窮，危及地球生物安全」^③等醒目的標題之下，携手發動大規模示威活動。此一「共同呼籲」經傳播媒體發佈，受到約七百七十個和平組織公開支持，其中一百個團體是受德共的控制^④。

波共一九八一年底宣佈禁止「團結工聯」活動後，終止了西歐「和平運動」中共黨教條派與獨立派人士間的合作關係，西德「綠黨」大力抨擊德共支持「波蘭軍國主義」^⑤，導致次年元月十七日法蘭克福的「馬丁·尼穆勒基金會」(Martin-Niemöller Foundation)召開緊急會議，鼓勵西德的和平團體繼續奮鬥，拋掉波蘭政局的陰影^⑥。該基金會係一九七七年成立，一向受親蘇團體左右，社民黨政要(如巴爾 Egon Bahr)等人皆屬會員，尼穆勒本人即爲「克雷非示威活動」倡議人之一。由參加此次會議之名流即可看出共黨參與「和平運動」的積極^⑦。

註② 請參閱 *Erklärung seitens der Bundesregierung: Deutscher Bundestag, 9. Wahlperiode, Drucksache 9/1057, 19. 11. 1981.*

註③ Helmut Schmidt, "The 1977 Alastair Buchan Memorial Lecture" (Londo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October 28, 1977), in: *Survival*, January/February 1978, p. 2ff.

註④ 請參閱 Aktion Suhrzeichen/Friedensdienste und Aktionsgemeinschaft Dienst für den Frieden (Eds.), *Bonn: 10. 10. 1981* (Lamuv Verlag, 1981), Bornheim, p. 7.

註⑤ 見 J. A. Emerson Vermaat, *op. cit.*, p. 62.

註⑥ 見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1, Dezember 1981.

註⑦ 見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8, Januar 1982.

註⑧ 參加此次會議之名流爲：

(1) 巴爾——會於會中力倡「安全共同體」(Sicherheitsgemeinschaft)理論。

(2) 荷蘭「禁中子彈組織」代表荷共書記 Nico Schouten。

(3) 東德「和平理事會」主席 Günther Drefahl。

(4) 莫斯科「美加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udies of USA and Canada)代表 General Michael Milstein。

(5) 「尼穆勒基金會」與西德「和平、裁軍、合作委員會」(KFAZ)代表 Alfred Meckersheimer 及 Gunnar Matthiesen。

親蘇派原想利用這次會議沖淡波蘭「和平運動」引起的負面迴響，但因「綠黨」大聲疾呼關切東歐人權問題，使共黨之企圖失敗。一九八二年四月在「和平運動」團體反對雷根總統訪歐的籌備會上，「綠黨」公開向德共的領導地位挑戰，其領導人之一凱莉女士 (Petra Kelly) 試圖將蘇聯入侵阿富汗與波蘭「團結工聯」困境提至會中討論未果，然而會中反美情緒高昂，甚至東德的獨立和平團體「犁頭干戈」亦未受重視，導致「綠黨」拒絕簽署共同宣言，流亡西德的東德共黨幹部巴洛 (Rudolf Bahro，現為「綠黨」黨員) 大肆批評德共為「東、西冷戰時期的老頑固 (ein Fossil aus der Zeit des Kalten Krieges)」，是共黨「和平運動」的代理人^{④③}。

西德「綠黨」深知德共在「和平運動」中力量強大，雖欲擺脫其陰影，但在德共蓄意形成的「親共網」下一再證實西歐「和平運動」若無共黨財力與組織之策應，絕不會有今日之成果。

2. 蘇聯對西歐「和平運動」之態度

一九八三年是西歐部署核武決定性的一年，也是歐洲大規模和平示威遊行活躍的一年，根據西德「聯邦情報局」公佈，蘇聯曾給予包括「綠黨」在內的各和平運動組織約九千萬馬克的貸款^{④④}。蘇聯對「和平運動」的宣傳，強調片面的「和平共存」，對東歐內部不聽使喚的和平分子則絲毫不能容忍。對蘇共而言，和平與軍力擴充永遠無法合而為一，列寧的理論——「能夠實現和平的唯一力量就是國際無產階級把鬭爭的武器轉向本國的敵人而不是轉向自己兄弟的堅強意志」^{④⑤}，至今仍然為蘇共遵奉不渝；而列寧所言：「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和平主義』分子將獲共產黨人支持，以瓦解資產階級社會」^{④⑥}，正為東歐共黨政權利用西歐「和平運動」，以分化西歐與美國盟邦關係的理論依據。莫斯科一再強調，蘇聯有誠意與西歐共同找出一個適於全體歐洲人解決戰爭的辦法，極力突出蘇聯亦屬歐洲大陸之說法，並將歐洲的分裂歸罪於美國^{④⑦}。

蘇共煽動反戰活動的着眼點，並不在渲染戰爭對人類的危險性，而是積極的在國際性區域性會議中拉攏友黨或意識型態相近的政黨，以達成赤化全歐之目的。一九八五年五月在巴黎召開的「歐洲社會黨大會」，有來自法、英、西、奧、義、德、荷等西

註④③ 見 *Der Spiegel*, 12. April 1982, p. 30.

註④④ 此處引自 *Newsweek*, June 6, 1983, p. 7.

註④⑤ 見《列寧全集》，中人民出版社，北平，第廿三卷，一九六一年，第一七七至一九六頁。

註④⑥ 見《列寧全集》，第廿卷，一九六一年，第二六八至二七三頁。

註④⑦ 見 S. Beglov, "European Security and the USA",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February 1983, p. 29.

歐十二國代表，共同決議反對雷根總統的「星戰計畫」，譴責美國的窮兵黷武將威脅歐洲安全與破壞國際集體安全體系^④。

不過，西歐國家的政治運作是以民意為基礎，蘇共的和平宣傳並未獲得大多數西歐人民之信任。民主國家中的自由信念必定以和平方式為依歸，對西歐的共黨而言，亦無例外。所以當前蘇共對西歐「和平運動」尚無法控制全局，僅僅達到興風作浪之功能而已。

3. 中共對「和平運動」之反應

在「歐洲核武裁軍」會議召開前，中共對西歐的「和平運動」尚持懷疑態度，僅僅零星式的發佈一些報導性新聞，警告西歐國家正視蘇聯的軍事威脅。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美國在歐部署核武，引發和平示威高潮，中共的態度始逐漸明朗化，一方面爭取和平主義分子支持，表明團結世界各民族之明確立場，另一方面則對北約盟國配合美國全球戰略表示異議。中共與西歐「和平運動」團體的正式接觸始於一九八四年，並於次年作出三項重大決定：

(1) 成立中共的「和平運動」組織：一九八五年五、六月間所成立的「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Peace and Disarmament)係一九八一年組成的「中國國際交流協會」(Chinese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下屬機構，受中共中央「對外交流部」指揮，並由「中央顧問委員會」成員李一氓擔任會長。

(2) 舉辦國際和平座談會：一九八五年六月四至六日來自世界廿四國五十一個和平團體的六十四名代表^⑤參加中共在北平舉行的「保障世界和平會議」；由中共與會成員的發言觀察^⑥，中共爭奪第三世界領導權之野心一如往昔。

(3) 派員參加一九八五年阿姆斯特丹舉行的第四屆「歐洲核武裁軍」年會；與會三名代表在會中一再強調中共對第三世界之立

註^④ 見 S. Smirnov, *op. cit.*, p. 47.

註^⑤ 與會各國代表包括日本「日中友好協會」會長宇都宮德馬、美國「凍結核武運動」主席、印度高等法院法官、巴西「裁軍及和平運動」主席等；西德與會代表來自三個政治團體：

(1) 「和平行動體」· Michael Schmidt。

(2) 「和平運動協調委員會」(Koordinationsausschuss) · Andreas Buro, Guido Grunewald。

(3) 「綠黨」· Uli Fischer。

註^⑥ 中共中央「顧委會」成員李一氓會中講詞包括六項重點：(1) 制止新世界戰爭的主要力量；(2) 維護世界和平而必須解決的最緊迫任務；(3) 實行和平共存五項原則同維護世界和平的關係問題；(4) 和平與發展關係問題；(5) 如何評估各國和平運動；(6) 中國對世界和平事業之貢獻。見中共《人民日報》，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第七頁。

場，抨擊美蘇缺乏限武談判之誠意。

從忽視至積極參與，中共對西方「和平運動」重新作戰略上的評估，其因有四：

(1) 根據蘇聯公開支持西歐「和平運動」之事實，中共難以忍受莫斯科獨霸「世界和平理事會」，同時一九八一年後，西歐和平主義分子逐漸傾向「反美亦反蘇」的態度，中共以為有機可乘。

(2) 中共認定美、蘇是表面談判，背地裏加緊擴充軍備，「限武」祇是一種和平的假象^⑤。

(3) 當「歐洲核武裁軍組織」與親蘇的「世界和平理事會」關係惡化之際，中共認為是拉攏西歐民間團體的時機；對於東歐的「和平運動」，中共則為之辯護，指為「無派系運動」(Dissident Movement)^⑥，以避免波蘭「團結工聯」事件在中國大陸重演。

(4) 「歐洲核武裁軍會議」主題之一，是阿富汗問題與「南北問題」，中共面臨蘇聯的包圍戰略，自然會藉題發揮。

由於地緣與文化背景關係，中共對西歐「和平運動」的支持有相當程度之限制，目前僅止於相呼應，尚無深厚之影響力。同時中共亦顧慮到過分支持，恐將引起西歐政府之不悅，為免影響雙方關係發展，在作法上勢必再三斟酌。然而西歐和平政治團體拉攏中共以牽制蘇聯的想法，無形中却又提昇了中共在世界「和平運動」中的地位。

六、結 論：「和平運動」對決策形成之影響

「和平運動」之理論與現實環境混淆不清，在西歐國家當政者眼中，它祇是少數政治社會團體的一種權術運用；尤其共黨滲透其間，與其說是為求和平，不如說是利用「和平運動」作為統戰工具。至於「和平運動」，對決策形成之影響力到底有多大，各家意見不一，主要有兩派看法：

(一) 由於新和平主義引起的「中立主義」傾向日增^⑦，此派認為「和平運動」本身雖然無法對一般擴軍或特殊的戰略思想草擬

註⑤ 見中共《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日，第四頁。

註⑥ 見 J. A. Emerson Vermaat, *op. cit.*, p. 60.

註⑦ 此派如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西德著名的「亞倫巴赫」民意調查機構負責人) 女士等代表西歐「和平運動」，「中立主義」傾向；此外法國一刊物 *Le mouveur Observateur*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廿一日刊出西歐四國民意測驗結果，顯示西歐「中立主義」傾向有高漲之趨，請參閱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Die Stille Revolution-Wandlungen im Bewusstsein der deutschen Bevölkerung*, in: *Allenbacher Jahrbuch der Demoskopie*, Bd. 7, Wien u. a., 1977.

其政策觀點，但是民意支持與否對未來西歐國家制定對外政策則具影響力。「中立主義」無疑為蘇聯所樂見，但為西方盟國領袖所擔憂。

(二)另一派認為「和平運動」祇是一暫時現象，是一種漸進的道德衝擊所產生的結果，各和平團體也為維護己見而產生摩擦。欲將「和平運動」導向正途，決定性因素仍在價值體系（唯物與非唯物觀之爭）之改變^⑤，一旦集體道德衝擊能夠克服，一切非理性問題則可迎刃而解，共黨是否真能將「和平運動」納入其思想體系，仍為一大疑問^⑥。

註⑤ 「非唯物觀」指精神面之價值，講求個人自我滿足，能參與政治和社會之決定形成，超越物質生活享受；社會學家將此現象詮釋為「需求、期望及價值取向的『無聲革命』(Silent Revolution)」。Ibid.

註⑥ 見 *Süddeutsche Zeitung*, 9.12.1981, p. 8.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副研究員)

中共的政治與戰略

本書係日本東京大學教授中嶋嶺雄所著；趙倩、張隆義、楊怡芬等譯，曾永賢審稿。

本書旨在找出，自從中共政權明確的脫離毛澤東模式以來，迄今所歷經的各種軌跡，並對中共未來的發展取向作一預測性展望。全書十七萬字，計二九〇頁。實售平裝新台幣二〇〇元；精裝新台幣二四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印行